

襄垣文史資料

第五輯

政协襄垣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政协襄垣文史资料

第五辑

政协襄垣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分管副主席	韩克昌		
副主任	冯引子		
委员	王兴明	史启荣	刘国青
	李招财	李月明	张喜荣
	苗瑾	屈毓华	郭树华

松紋文史資料
弘楊民族文化

史進清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王玄亭

征集文史资料
服务社会主义

王悦盛

目 录

史海钩沉

- 襄垣县几个重大政治运动纪实……………张林源 (1)
- 国共合作的光辉战例……………苗 瑾 (25)
- 两次攻打襄垣县城实录……………冯耀斌 史启荣 (34)
- 侵华日军在襄垣城的滔天罪行……………暴晋宏 (41)
- 善福坪阻击战……………苗 瑾 (44)
- 善福村的“打盐事件”与天主教发展史
……………苗 瑾 (52)
- 战士怒打“穆仁智”……………苗 瑾 苗延禾 (57)

古韩名流

- 爱国志士——李庆芳……………韩宏喜 (62)
- 我做地下交通员的回忆……………刘万和 (74)
- 只身入虎穴 热血洒太行……………赵富保 (95)
- 智勇双全的武委会主任张官卯……………史启荣 (101)
- “无名女英雄”——王银秀……………张林源 (106)
- 爱国神父白嘉诚……………苗 瑾 (115)
- 连氏“三雄”……………屈毓华 (117)
- 乐为秧歌献终身……………苗 瑾 冯世昌 (132)

曲坛艺人郑花龙……………苗 瑾 冯世昌 (134)

当代英贤

一位劳动模范的创业史……………苗 瑾 冯引子 (135)

一个热衷于集体化道路的老农民……………

……………苗 瑾 冯引子 (140)

陈二明与长岭农业合作社……………张怀旺 (144)

赵学文和他首创的《一年早知道》……………苗 瑾 (156)

李齐荣与亿元村……………赵巾又 (162)

回眸历史

襄垣县金融业简述……………陈润兰 (172)

襄垣广播电视发展史……………张春芳 (197)

襄垣的集贸市场与对私改造……………李永福 (202)

襄垣县粮油加工厂发展纪实……………崔拴景 (208)

红旗商场的创建和发展……………李月兰 (214)

鹿亭幼儿园的历史与现状……………襄垣教育局 (219)

文坛撷英

说古道今话强计……………赵巾又 (222)

风雨沧桑话故乡……………苗 瑾 (228)

南腔北调故乡人……………苗 瑾 (231)

襄垣县几个重大政治运动纪实

张林源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通过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派中共党员多运海以牺盟特派员的身份来襄垣秘密从事建党工作。同年10月，襄垣县牺盟分会成立。随后，八路军工作团进驻襄垣，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年11月，在八路军工作团团长傅竹庭帮助下，中共襄垣县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称县工委）。县工委成立后，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积极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破路、填井、空室清野等工作。并于1938年4月，全县组建了3个党的区分委。此后，襄垣县独立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及农、工、青、妇各界抗日救国会相继成立。县工委遵照上级指示，采取秘密斗争方法，着手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同时积极开辟襄垣抗日根据地工作，并着手建立民主政权。1938年9月，襄垣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从抗日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多年，共产党领导襄垣人民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我除屯集公粮运动没有参加外，减租减息、反特斗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反肃反、抗美援朝、反右派、大跃进、当年四清，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等我都亲身经历过。加上两次编修《襄垣县志》，查阅档案资料，更丰富了我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了解。这次县政协出版第五辑文史资料，我把历次政治运动的梗概如实地记录下来，公布于众，

请当事人和参加者看后多提意见，进一步核实校对后正式出版。

屯集公粮

1939年9月，襄垣县抗日政府在肖家垛村召开了县、区、村65人的主要干部会议，共商完成屯集公粮任务。首先由县牺盟特派员多运海同志讲了屯集公粮的重要意义，他说屯集公粮是为了抗击日寇，保证军需民用，是打击封建势力削弱地主经济，提高劳苦大众威信，调动全民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抗日县长徐国华动员说，目前上党地区的重要村镇都被日寇侵占，旧政府垮台，新政府还没建设好，目前抗日军民需要大批粮食。广大穷苦劳动农民又拿不出粮食来。所以，我们要反复贯彻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的抗日方针。上级分配襄垣县秋季屯粮任务是五万石，我们县只能超额完成，不能少完一粒。最后各区、村长和区分委们根据平时调查了解的情况，对自己管辖内的富户进行了分类排队，各自划定完成屯粮数目，而后县政府根据各区、村讨论情况，制定了全县屯粮计划并研究了工作方法和步骤。

9月10日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开展了屯集公粮大宣传大发动。51个编村都分别召开各阶层人士座谈会。贫苦农民座谈会是讨论哪家地主、老财能交多少粮食，定他们怎样支前抗日；中等户座谈是解决自己能交多少粮，自己为抗日办些什么实事，评论本村富户谁家交多少粮食就合理；地主、老财座谈会是讨论如何用实际行动抗日救国，如何帮助贫穷农民抗日，在提高思想基础上，让他们自己自报交粮数额。而后，以编村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富户自报交粮数额。经

过群众讨论，民主议定各富户应交公粮数，当众举手通过，作为定案，限期完成交粮任务。在各编村召开座谈会的同
时，县政府也召开了全县有名大富户会议，学习讨论了国破家亡、匹夫有责、独立自主、抗日救国、屯集公粮、支前杀敌等重要意义，当场有东北阳村大富户王维新自报捐款1000元（现大洋），捐粮20石，夏店富户李庆芳捐粮50石，西营富户王量宏捐粮20石。各区、村也先做好了一些大户工作。在各村召开群众评议会时，首先由这些大户带头自报交纳抗日公粮数额，他们自报的数额都比群众计划评议的多，当场受到群众欢迎。由于各区村典型工作、思想工作做得好和县长徐国华率领四支屯粮突击队，分赴各村，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就地解决。所以，经过两个半月的艰苦工作，全县完成屯集公粮6万石，比上级分的任务多1万石，保证了全县军需民用，打击了封建恶霸势力，贫苦农民初步抬头。

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是1938年5月襄垣抗日政府根据上级指示提出来的，因为多种因素未能进行这项工作。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民主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是当时调整阶级关系最合理的办法，是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加强对敌斗争，提高生产，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最本质的一环。当时农民深受封建社会的苛捐杂税和高租高利的盘剥，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怎有力量奋战抗日？1936年全县贷债户8100个，占全县总户数的五分之一，户均债款50元左右，平均利率在1.82分。为了团结抗日，襄垣抗日政府领导劳苦大

众进行了反对贪污，改造政权，实行合理负担等民主革命工作。1939年全县进行了反顽固斗争，农民们在政治上抬起头来，封建地主的高利贷剥削受到了打击，全县30%的合理负担，放在地主富农身上，大大地调动了贫下中农的抗日积极性。

1942年春天，襄垣抗日政府根据中共中央通过的“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结合本县反维持斗争，制定了九条斗争纲领：一是没收汉奸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与抗属。二是维持款一律退还群众。三是分配伙地、庙地、社地给贫苦农民耕种。四是清理旧债，反对不退文书。五是租地半租地实行减租。六是清算村里帐目，反对贪污。七是清算合理负担，反对负担不公。八是反对打骂虐待妇女。九是实行优抗代耕。襄垣抗日政府在领导劳苦大众执行中，发现贫雇农怕地主反攻，怕变天，有的人认为种地交租应该。根据这种思想，县政府派工作组到各村进行思想大发动，引导农民反思，围绕穷人是怎样穷了的？~~地主~~是怎样富了的？谁靠谁活，该不该交租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群众们用自己的生活经历找到了穷根，一致认识了是穷人养活地主，更不应该交租子。在此基础上，各村成立了减租减息委员会，先后召开各种宣传、动员、讨论会，明确了减租减息的意义，掌握了减租法令，学会了“四一”、“二五”减租办法和付利超过本钱两倍，无条件抽回押地，付利超过原本一倍，停利还本抽回押地等具体办法。同时召开地主、富农会议，反复讲明减租减息是为了贫苦农民有饭吃，能为抗日出力，给你们交点租息是为了团结抗日，劝他们执行法令，自动减租减息。在具体工作中，有少数顽固地主抗拒不减，有的明减暗

不減，有的白天減租息，晚上要利息，有的宣傳變天恐嚇等等。抗日政府根據這種狀況，先後在各區、村選擇最頑固分子的代表人物召開了減租清債說理鬥爭大會，有的村拉着地主游街，有的掛牌鬥爭，有的村農民帶着口袋，扛着木杠，擁進地主院內，揪出地主，讓他們交出租地文書。通過群眾運動，完成了減租減息工作和給長工增加工資任務，這樣大大削弱了地主富農經濟。如地主由每戶平均142畝土地，下降為38.3畝；富農土地由每戶平均92畝，下降為75畝；長工工資由每月三斗提高為六斗。農民們通過減租減息運動，共收回押地405畝，收回惡霸霸占的土地560.8畝，分配伙地1292畝，分配社地699畝，沒收漢奸土地160畝，清算物債233件，退還維持款和鬥爭罰款6703.5元，分配糧食306.7石。

為鞏固群眾鬥爭成果，1943年5月，在全縣開展了反漢奸和反抗拒查減運動。1944年，為便利減租減息政策的徹底貫徹執行，又在全縣普遍深入地進行了一次查減運動，解決了少數人的明減暗不減和退租、賠償、租率提高等問題。

反“特”鬥爭

1941年春，襄垣縣抗日根據地出現了特務活動。所謂特務就是國民黨特務（新民會）和日本帝國主義特務的結合體，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勾結一些封建勢力，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機會，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根據地造謠言、打黑槍、割電線、下毒藥、探聽抗日情報、引敵出發、包圍村莊、暗殺幹部、活動維持日寇等破壞抗日活動。1941年底到1942年春，全縣形勢惡化，日寇每天出發掃蕩，不少幹部群

众被捕，人心惶惶。全县除龙王堂、坪村、上良、新民、罐烟、城底六个村庄外，其余村都挂出了维持会的牌子，造成全县大维持的局面，特务分子、封建势力扮演了主要角色，群众对此十分痛恨。政府根据群众要求，于1943年9月镇压了襄垣特务头子王茂官、李兆祥、郭希贤，对坦白交待较好的郭宏俊等7人进行了劳教。

1943年10月，襄垣县根据太行三地委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反特务斗争。12月反特斗争纵深发展，到1944年春，全县共反出特务分子7000余人，占根据地成年人口的一半。县、区、村三级干部除少数人外，都反成日特分子，交出上万斤毒药，打黑枪数百次，抗日民兵的武器也变成了特务打黑枪的武器，投毒一万次，谋杀干部上千次，收割电线200米，反出的“特务”们自己编造了拉拉队、石头队、冷枪队、收割电线队、毒药队、转送情报队等特务组织。当时县委领导分析，全县特务这么多，特务到处下毒药，没毒死一个抗日干部；特务割了上千次电线，抗日军政电话畅通无阻；到处打黑枪，没打死一个军政干部。当年三月，县委根据上述情况判断，肯定了襄垣反特扩大化是上了真特务的当，所以，县委当机立断，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停止了反特斗争。

为什么造成反特扩大化呢？一是县委、政府对特务作了过高估计；二是错误地理解了特务是有群众性的（所谓“群众性”，是指特务活动的方式是以群众面貌出现的，我们很难发现。当时县委理解成人数众多的意思，所以全县反出许多假特务）；三是反特务的方法错误，从县到村，都是以特务反特务的办法，再加上逼供信，特务越反越

多。所谓以特务反特务，就是真特务供了假特务，而后抓起假特务让他坦白交待，供出他发展的特务，然后再照名单抓人审讯，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干了三个多月。教训非常沉痛。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襄垣劳动人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完成民主革命的最后任务。土地改革前的1946年，全县实有耕地535357亩，总人口为14万多，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10%，但占有土地量为70%，由此可见耕者无田，有田者不耕。

1946年2月3日，襄垣县召开了县区干部会议，在总结前段减退租息基础上，布置了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对汉奸、恶霸、封建地富清算压迫帐、血汗帐、生命帐运动。全县323个村镇，都采取了联合斗争总清算，中、贫、雇农齐翻身。当年4月10日统计，全县八个区先后召开84个反奸公诉大会、120多个说理清债斗争大会。在这些会上，劳苦群众用自己的苦难经历，控诉了汉奸、恶霸、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帐，教育了群众，提高了觉悟，推进了运动的发展。同年5月以后，襄垣县委、政府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在斗汉奸打恶霸的基础上，深入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因为贫雇农受封建势力剥削压迫最厉害，苦难最深重，他们要求翻身最迫切，斗争也最坚决，最勇敢。所以，在整个运动中，始终坚持贯彻执行了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在斗争中贯彻了“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总清算齐翻身，大家算，

大家分，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贫农、中农团结紧，齐向封建地主倒苦水、追穷根的说理斗争。通过诉苦说理斗争，使人民懂得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

1947年9月，全县土地改革结束，全县农民从地主、富农手里收回土地118294.30亩，共获斗争果实：房屋38559间，牲口3455头，粮食78443石，冀钞40956405元，衣服703830件，农具39473件，银洋48029元，元宝6700两，黄金16两，共斗了地主、富农856户，占全县总户数的7%，分到果实的贫下中农30982户，占总户的67.65%，肉体消灭封建地富157人，占总人口的0.11%。

1947年10月10日，党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农民翻身、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人民大宪章，襄垣人民高呼宪章万岁！紧接着县委、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自上而下的进行了一次普遍深入的翻身大检查，开展了割尾巴、填窟窿、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少地补地、少房补房的填平补齐运动，同时对278户错斗中农进行了补偿纠正，对低头认罪728户地富进行了安置。

“三反”、“五反”

1952年，襄垣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为医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八年的战争创伤和旧政府留下的破摊子，进行改观换装建设运动。但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意识严重地侵蚀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都表现出资产阶级的个人享乐主义，他们不管做什么，都是挥霍浪费，损公肥己，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严

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即将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

1952年1月4日，中共襄垣县委、襄垣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提出的大力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精神，成立了襄垣县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同月16日，在县、区干部、国营、合营厂矿、企业、小学联合校长、完校以上的教职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与此同时，在全县41个工商行业、820个商贩中，开展了群众性的反贪污、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经过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40天激烈战斗，在县、区级国家干部和厂矿企业中，共检举揭发出贪污分子234人，占参加三反、五反总人数的35.6%，查出贪污盗窃国家财产达900万元，其中贪污10万元以上的“大老虎”18人；在五反中，共揭发出有五毒违法行为的765户，占工商业总户数的93.2%，非法窃取款额达980万元。工头崔秋红用行贿手法收买干部，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窃取国家钱财120万元。三合元商店偷漏国税520万元。各单位都有损大公肥小公和集体浪费现象。投机私商张富锁，给银行干部送皮鞋一双，贷款30万元，共获暴利11.2万元。有的用“美人计”拉干部下水，有的利用职权动用公款，假公济私，窃取国家财产，有的伪造假帐，私改单据，挪用公款，投机倒把等。

“三反、五反”运动为什么时间短、收效大呢？主要是正确执行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思想批判从严、纪律处分从宽的原则和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这样使不法分子，从心灵上真正认识到自己为国家造成的危害。打退了资产阶级